



杨又华 刘瀚潞 邢玲

引言

时值冬季,小雪节气过后,潇湘大地暖阳浪漫,秋意尚浓。

我们一行人从长沙出发,前往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。这里是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

的出生地,也是他的长篇小说《山乡巨变》的创作背景地。

67年前,也是一个秋冬时节,周立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。此时的中国大地上,一场浩浩汤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开展,它将重构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,催生出古老山乡的巨变。近十年里,周立波深扎故乡,参与着、见证着、记录着这场变革,写下了《山乡巨变》等文艺作品。

如今,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鼓角已然奏响,又一幅山乡巨变的长卷正徐徐展开。我们走进周立波的故里,寻访他留下的足迹,探寻今人书写

的故事,感受两次巨变下一个中国山乡的精神传承。

印象广场·入乡

距离益阳中心城区十来公里的清溪村,坐落于连绵不断的丘陵间。不远处,志溪河北入资江,奔向烟波浩渺的洞庭湖。

初冬的早晨,风和日暖。空中升腾起湿润的云雾。漫山漫岭,满目青翠,温柔的阳光给万物缠上一层淡金色的柔纱。低矮丛生的草团里,朝露星星点点。

印象广场上,中轴北侧,一座长29.98米、高9.98米的“喜庆丰收”群雕巍峨仁立,好似一本翻飞的书卷,又像一只展翅的凤凰。

“那是谁?”一个孩童指着雕像正中心,一位戴着方框眼镜、卷着裤腿坐着的人问道。

“那是周立波!”雕像中,水牛憨厚,黄狗调皮,莲蓬莲藕装满箩筐。周立波背靠着青山绿水,坐在田间地头,一手拥着孩子,一手握着钢笔,脸上满是笑容。他的身边,围坐着抽着长烟杆的

老农、靠着扁担的青年、握着红缨枪的民兵、神采飞扬的劳动妇女,众人聚在一起“春啪啪”(益阳方言里聊天的意思)。

这是当地人心中最熟悉的周立波的形象,也是来到清溪村的游客们对周立波的第一印象。

1954年秋冬,46岁的周立波风尘仆仆,从北京回到老家益阳。

此时的他,已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,创作的小说《暴风骤雨》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。尽管如此,他却没有一点大作家的调子。

“那天,市委办公室通知我开会。一进门,市委书记就指着一位留短发、戴眼镜、穿着朴素、身材魁梧的人,问我认识吗?”

周立波的堂弟、时任益阳县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周粤梅,回忆起当年见到周立波时的情景。

“我是周立波,你的风翔哥啊!”一口浓重的益阳方言,一句热情的回应,周立波瞬间就与周粤梅亲近熟悉起来。

回到故乡的第二天,周立波立马让堂弟给他讲讲益阳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情况。当晚,两人聊到深夜才入睡。

微风拂动的秋山里,洁白的山茶花,杂着红叶,斑斓地掩映在青松林里。资江的水悄悄落下,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。一只横河筏子上,周立波、周粤梅等人,已备好物资准备下乡。他们从资江过河,经黄泥湖沿志溪河而上,抵达清溪乡最先建立的石岭村初级农业社。

在这里,石岭村初级农业社社长朱雨生向众人讲起农业社的情况。一场座谈会后,周立波等人又走访了几位入社和未入社的农户。

此后的四个月里,在谢林港区姚家湾村、高桥村、楠木塘村、中山村等地,人们时常能看见周立波的身影。在邓石桥乡政府的一间一面没有墙壁的空荡荡的大厅里,周立波的床铺也成了开会时人们最喜欢的“软席”。

“如今湖南农村只吃两顿”“农民都是把杂粮掺在大米里吃”“好多农民喂不起猪、鸡、鸭”……1955年2月21日,周立波在一封递给刘少奇的书信中,讲述了他在益阳农村四个月里所目睹的粮食问题。

为了提高农业效益,出产更多粮食,积攒更多资金,广袤的中国农村土地上,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开展,周立波心里的创作种子也在生长。

日头越升越高,印象广场上,游人如织。人们一路欢声笑语,一会儿在戏水榭前伴着亭亭美人蕉、点点绿荷拍照留影,一会儿在刻着“红桃花色”等益阳方言的文化墙前驻足念叨,一会儿在清溪市集上摆开围观着风车、石磨盘等传统农具。

广场西北角,一眼水井旁,一座雕像刻画了《山乡巨变》开篇中,女干部邓秀梅初次入乡,向乡亲盛淑君询问清溪乡方向的场景。

“盛淑君”抬起手,指着远处的山边。不少人便循着她指引的方向,入乡而去。

他们中,有清溪村的客人朋友,有清溪村的返乡、入乡建设者,还有《山乡巨变》的读者和周立波精神的追随者。

一个中国山乡的精神传承

——周立波故里行



清溪村村貌。清溪村供图

清溪画廊·建社与建设

沿着木栈道往前走,穿过一丛从一簇簇、迎风摇曳的芦苇,便踩在了清溪村松软的草地上。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青草、泥土混合的气味,清新沁人。

湛蓝的天空上,几丝淡淡的云彩自由自在地飘着。飞机偶尔掠过,拉出一条条整整齐齐的航迹云,随即又被风吹得柔漫。“嗡——”地一声,火车来了。拉着物资的货运火车,载着旅客的绿皮火车和城际列车,时常在石长铁路上呼啸而过。铁路桥墩上、清溪大道旁、木质长廊两侧,200多幅连环画、地雕、浮雕,描绘着《山乡巨变》里的情节,展现着清溪乡的建社故事。

这些故事,是周立波深入农村、扎根土地的采访所得,也是他亲身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的真实写照。

1955年9月,深秋时节,山岭里桂子飘香。在创作反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《盖满爹》后,周立波再次回到故乡益阳。

“光走马看花,得到一些表面的印象,是不能写小说的。”这一次,周立波决心深入扎根,更直接地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。

他带来了妻子林蓝和年幼的女儿,在竹山湾村一座带小阁楼的木板房里,安下了家。

安家之后,他立即到大海塘乡参加建社工作,担任了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
然而,建社工作可不比写小说轻松!当时,大海塘乡的一个偏僻的山村——旦家村,正在办初级农业合作社。村里的富裕户较多。对于入社,农民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想法,有的积极主动,有的犹疑观望。

为了建社工作,周立波和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陈桂香,在乡政府所在的葛彬祠祠堂的木板房里开了一个铺。每天起早贪黑,冒着隆冬的风雨和严寒,走村串户,和群众同吃同劳动,打成一片,细致深入了解了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态度;组织、参加会议,同大家一道学习有关政策,调动农民群众积极入社。

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后,初级社办起来了。周立波将它取名为“风鹤社”。

正值办社的高潮时,几封从北京发来的电报,却不断催促着周立波回京。原来,是中国文联通知周立波去德国访问。因办社事忙,周立波发了几次电报请假,都被驳回。无奈之下,周立波只好出发赴德国。

同行的作家巴金曾回忆,一路上,周立波一会儿后梅,一会儿抱怨,对办社念念不忘,归心似箭。

十来天后,周立波迅速结束出国任务,回到益阳,又火速加入合丰初级农业社转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。

高级社成立后,人们正月都不再“吃春酒,走人家,打花鼓和摊牌九”,年轻的男女们情绪高涨,个个摩拳擦掌,准备春耕。

时间推至2008年,清溪村里,也有一群人摩拳擦掌,准备大干一场!一场新时代的

山乡巨变,正由众人聚力书写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周边十几个村庄里,清溪村的经济实力排名垫底。一辆独轮板车,是人们赶集的交通工具。一列窄轨货运小火车,曾是人们出行的“顺风车”。

2008年以来,清溪迈开了“巨变”的步子。立足作家与作品、田园与民俗、传统与现代相融的乡村旅游特色,清溪村打造了以“绿色”“红色”“古色”为主题的清溪文化旅游品牌。

2018年,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声声号角下,清溪村景区提质改造工程启动,以城市文化主题公园、智慧乡村展示平台、田园养老体验基地为建

设理念,周边村落纷纷牵手清溪。曾经的清溪将变成“泛清溪”,全新的清溪村旅游区正在徐徐铺展画卷。

周立波故居·创作

黑青色的柏油村道曲曲弯弯,道路一侧,一条清溪蜿蜒流淌。清溪两岸,田野里的稻子已收割完毕,留下的稻草墩站得齐齐整整,“生态再生鱼稻”“生态巨人稻”的牌子还在与人分享丰收的喜悦。远处的几畦菜地里,蔬菜长势正盛,偶有村民扛着锄头、提着塑料桶在田埂上慢行,好不恬静自在。

山岭间,青瓦粉墙,点点伫立,各式各样的现代民居院落倚着山、傍着水。一座古朴的穿斗式三合院,映入眼帘。这便是周立波故居了。它依山傍水,坐北朝南,土木结构,悬山小青瓦屋顶,土筑围墙,厢房庭院错落有致。

1962年12月,54岁的周立波再回益阳农村深入生活。此时,《山乡巨变》已完成出版,但他依旧笔耕不辍。

只请人稍微修缮后,他便住进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宅。西厢房第一间的卧室里,居日期间,周立波通常都在这里写作。为了获得足够的书写光线,朝东的木板墙壁上,安装了几页很大的玻璃窗户外。

离窗户外约四五米的地方,有一株硕大的油茶树。树影绰约,映入房前。书桌前,周立波面容清瘦,埋头读书、写作。

那些年,在故乡的清溪村、瓦窑村、竹山湾,周立波便是以这样相似的姿态写作《山乡巨变》。但伏案记录、写作,只是周立波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。

《山乡巨变》是从泥巴里拱出来的一部小说!不论春夏秋冬,风霜雨雪,每天只要鸡一叫,周立波就起床。他去地里挖土,下田做凶肥、插秧、扮禾。每当春耕和抢收抢插的大忙季节,他和乡亲们一样,腰间系一条浅蓝色毛巾,扎脚勒手,汗流浹背。人们亲切地称他为“立波胡子”。他认为,只有同农民群众劳动生活在一块,才能真正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。

“今天早晨和上午帮农业社插田,在田里看见两条蚂蚱”“白天参加了田间检查……来回走了二十多里路……晚上8点钟,在乡政府学习省党代表会文件”……在日记里,周立波细细记下这些劳动的场景,也为写作收集素材。

周立波的侄儿周兆民回忆,周立波常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,闲暇时就拿着一支铅笔,在稿纸上写写画画,构思小说的人物关系图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阁楼木地板上传来来回踱步的声音,那是周立波还在思考着小说的创作。

周立波真诚地与农民群众相处,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待到写作时,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角色就自然地涌上笔端,他们的故事就顺溜地发展。

今天,与周立波一样,在乡村的土地上进行“创作”的,还有一群新时代的创业者,他们在描画创作新时代乡村的美好未来。

清溪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昂,今年已经61岁。《山乡巨变》中的动人段落,他张口就能诵读。5年多前,怀着对家乡的情谊,他放下外面的生意,毅然回村,当起了领头人。这些年,他起早贪黑地忙碌着,四处召唤寻找返乡建设家乡的乡亲,着力培养新的党支部带头人,留住村里的优秀人才。

“90后”邓旭东,是贺志昂召唤回乡的“排头兵”。回乡前,他在广东从事自媒体行业,年入四五十万。村里越来越好的人居环境、特色产业和文化生活,吸引了他回家就业。2019年,从一名便民服务员开始干起,现在成了村支委委员。

和邓旭东一样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着建设家乡的一腔热情,回到了村里。现在村支委里,有了2名“80后”、3名“90后”。

梨园·满园芬芳

夕阳西沉。

距离周立波故居约100米的陈树坡上,一大片梨树绵延分布,满山火红。枝干虬劲挺拔。被风吹落的红叶,夹杂在枯黄的野草之中,格外惹眼。一条梨园小径上,游客们一路赏景一路欢畅。

梨园旁,比人还高的芦苇丛里,余晖穿过缝隙,透出暖暖的黄色,把芦花映得金灿灿。有村民走出屋来,收起了晾晒在屋外的红薯干、腊肉,小黄狗跟着人脚步欢快地跳跃。一人一狗的影子被拉得老长。

1962年底,陈树坡上还是光秃秃的。当年,周立波母亲去世。年底,周立波回乡扫墓。到了陈树坡,脚正好踩在一个桃树苑子上,四处杂草丛生,原先的果树不见一棵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,叹道:“陈树坡可惜,太可惜了!”

第二年春天,周立波拿出自己的稿费来,买了梨树苗,还请来一位农技师作指导,发动乡亲把树苗栽上。烈日下,一群青壮年,撸起袖子,挥舞锄头,卖力地挖下坑洞,种下了棵棵梨树。

建梨园,是件喜事。周立波要和大家照个相做纪念。他把乡亲们分作两排,站在一棵最大的梨树苗前。大家推他站当中,他高低不肯,坚持要站在后排边上。大家一起照了一张相。

棵棵梨树,扎根泥土,茁壮成长。多年后,这儿的梨树每逢秋季硕果累累,成为了村里一笔较大的收入,给乡亲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、满园的芬芳。

“立波胡子”留给乡亲们的,不只是年年芬芳的梨园。

他给乡政府赠送自行车,方便干部走家访户、开展工作。

他捐赠3000多元,建设农民俱乐部、畜牧场,帮助乡亲们致富发展。

他买来为乡亲们讲述政策、播报新闻、提供娱乐的广播大喇叭,给偏僻山乡送来文化的种子。

他给宣传队赠送道具服装,让老乡们在辛勤劳动后能享受文娱生活的欢愉。

他把家乡人对时代的回应、对土地的深情,写进《山乡巨变》,为山村埋下新时代巨变的种子。

“田野静静的,人们踏着路上的干雪,各自回到各自的家里,等待着开天,等待着春耕的开始,以便用自己的熟练的、勤快的双手,向自然、向黑土,取回丰饶的稻麦和果实。”在《山乡巨变》正篇的末尾,周立波这样写道。

如今的清溪,是热闹的。闪烁的灯光在山岭间渐起,大道旁的路灯如一串珍珠宝石,腊肉、腊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。

清溪村部、清溪文旅集团办公楼里,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。背着书包的孩子们,从村口一路小跑着回来。游客们意犹未尽,端着擂茶一步三回头。

再过片刻,村里的清溪文旅舞蹈队又要聚在一起跳舞了。一曲《红旗颂》的音乐响起,大姐们舞动着扇子,身姿柔美。

这个曾经的偏远乡村,如今生机焕发。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5千多人扎根于此、建设乡村。村集体经济资产达2000余万元,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。

山乡巨变,山河锦绣。

新的时代,人们不再等待着开天,等待着春耕的时节。就在当下,人们耕耘着自然黑土与文化底蕴,结出丰饶的生活果实。

湘江观潮

南杨

在清溪村两天半的走访里,我们对周立波“人民作家”的称谓有了真切、丰富和深刻的感受。

他去世42年了,他的《山乡巨变》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也已远去,但是,他和他的作品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,依然在这方土地上散发着馥郁的芳香。他回乡、劳动、写作的故事,在乡亲们中口口相传,娓娓讲述;他小说的故事、人物、场景在一组组雕塑、连环画廊和剧场演出里栩栩如生,趣味盎然;他作品营造的优美意境和浓醇的民俗风情,变成了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和流动在空气中的文化气息。

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,不少清溪村的村民居然能够大段大段背诵他的作品——因为,那些文字所描写的生活、所使用的语言,让他们感到如此熟悉、亲切、有味和美好!

从大历史的视角看,任何作家、任何文学作品的主题或许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局限性,周立波同样如此。但是,人民性,赋予了他文字不朽的光芒。

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,来自于他对党的“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“二为”方向的高度自觉坚守。作为党的文艺战线的战士,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从文学新人到战地记者到作家、学者,周立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

的写作原则,他所有作品的笔触对准的是普通战士和劳动大众。他拳拳服膺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,“为谁写,给谁看”,在他心里从来没有过丝毫疑虑。

为了更好地表现大众,贴近大众,他在语言文字上进行了一番自我革命,由过去欧化痕迹明显的语言变成了大众化的、具有中国风格的语言,在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及其他乡土小说中,他更特意选用了大量俚语土话,从而形成了独有的立波风格语言。

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,来自于他扎根土地、扎根人民的严肃的写作态度。他说“采风是不能写小说的,只能写散文”。1954年11月,他响应号召,回到故乡益阳,并深深扎下根来。前后7年时间,他生活的根就在家乡,其中整整两年住在乡下。那段时间,他的身份首先是作家,而是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。在乡里,这个副部级待遇的国家一级作家,成了乡亲们口中的“立波胡子”“风翔哥”“风老三”,成了地道的乡村干部和农民。一身灰蓝布中山装,一双解放鞋,一口益阳土话,干各种农家活,除了架在脸上的那副方框眼镜,以及格外喜欢“着热闹”和“春啪啪”(益阳方言里聊天的意思)外,他与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。

这种深厚的“生活体验”,使他得以用清新朴素、真切自然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,塑造出邓秀梅、刘雨生、李月辉、“李面胡”、王菊生、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描绘出一幅跨时代的乡土风情画卷。

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,来自于他深沉、质朴、纯粹的人民情怀。他深爱故土,深爱农民兄弟。他全心全意为乡亲们办事,一次次捐资为村里办公益事业、资助贫困乡亲。临死前他还在惦记着他资助过的两位村里的老人,嘱咐家人给她们送些钱去。作为作家,更重要的是,在心灵与感情上,他与乡亲们完全地水乳交融,“零距离”,他由衷地喜欢、欣赏乡村干部、农民兄弟身上那些可贵、可爱的品质,由衷地喜欢、欣赏那些有味的民情民俗。

为此,他笔下的各类人物,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,才那样鲜活如画,令读者心驰神往。

人民作家周立波用他为人民的书写,写出了了一个时代的山乡巨变。新时代新的山乡巨变,呼唤着更多周立波式的人民作家。清溪村正在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里化茧为蝶、再度蜕变,更宽广的乡土同样需要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!

人民性,是周立波作品的

不朽光芒